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14

王权与神祇

作为自然与社会结合体的古代近东宗教研究

上

[美] 亨利·富兰克弗特 著 郭子林 李岩 李凤伟 译

KINSHIP
AND GODS



上海三联书店

王权与神祇 上

作为自然与社会结合体的古代近东宗教研究

〔美〕亨利·富兰克福特 著 郭子林 李岩 李凤伟 译

KINSHIP
AND GODS



上海三联书店

总序

陈恒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迸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高质量、原创性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

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以求为 21 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中文版序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各文明社会中，王权与神祇、政权与神权就像是一对血脉相通的连体婴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切割地结合在一起。这种人神结合的现象在世界各地不约而同、概莫能外地出现——尽管表现形式和程度或多或少有所不同——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对理性时代的普遍认知，即人类历史发展具有统一性或规律性的哲学概括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当代学界怀疑风盛行，偶然性崇拜在历史认识中占据了优势。然而，至今没有哪个后现代学者能够摆出令人信服的论据，推翻历史哲学之父维科在《新科学》一书中提出的人类史存在规律的三条证据，即世界各个民族在时间和空间上尽管相隔甚远，却无一例外地拥有三种习俗：“1. 都有某种宗教；2. 都举行隆重的结婚仪式；3. 都埋葬死者”（维科：《新科学》，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33页）。现在看来，除了“都埋葬死者”的说法有些过头（因为也有不埋葬死者的民族，可改为都有处理死者的某种仪式）之外，维科的归纳至今仍然有效。这说明人类社会在由简单到复杂、永无休止的进化过程中，总有一些内在的必然性无法回避。史前社会晚期与农耕及游牧社会中出现的社会权力和神祇的普遍结合，便是一个隐藏在人类历史表象背后的某种规律性的坚硬论据。这说明在人类认识史中，为人们所坚守的常识或成说不会被轻易地颠覆。

为什么世俗权力要与神祇联姻？这个原初的问题不好解答，因为王权被罩上神圣的光环之时，并没有留下任何在场的记录和解说。我们不知道最初的法老、国王们神化自己的初衷是什么。本书作者富兰克弗特虽然试图对此加以解释，但诠释得有些过于玄乎，因为我们知

道连美尼斯其人的真假还是悬案，何来美尼斯的想法。^① 作者笔下的帝王将相的念头多半是作者自己的想当然。从后来的国王、皇帝们的做法看，几乎所有的神化行为都是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权力（政权、财权、军权和世袭继承权等）而给自己全身或半身贴金的结果，并没有什么更深远的超功利目的。由此类推，最初的国王们喜欢与神仙拉扯关系恐怕也都是出于实用的考虑。

宗教和神灵本来是因应人类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原本是人类自己的造物。根据目前的史料，至少在大约十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时期，人类就开始有了类似于安灵崇拜的观念。这种萌芽般的原始宗教意识一方面意味着人类思维的进步——不仅开始思考生存问题，而且开始思考终极性的生死问题；另一方面意味着我们这个物种——脊椎动物门、哺乳动物纲、人科、人属、智人种的认识局限。这种局限即使在今天科技昌明的时代也依然存在，因为只要包括科学在内的世俗文化不能可靠地解答人生的各种疑问，人们就会像自己的祖先一样要求助于能够解答这些疑问、寄托一切想望的超自然力量。倘若世间没有这个力量，他们便会创造这样一种力量。所以古代人想象出形形色色的神祇，设计出错综复杂的宗教解释体系，并且建起宏大壮美的庙堂文化，以满足自己的各种现实需要。在我看来，这就是人与神结合的根本原因，我们不必以不怪为怪。

当然，我们也不应据此否定本书作者的工作。本书的长处在于具体的分析和举证，毕竟作者是出色的埃及学和亚述学专家，收集和掌握了大量有关的史料，析解出古埃及和两河流域乃至巴勒斯坦王权与神祇之间密切联系的不同特点和具体表现，揭示了众多的细节。莫要小看这种揭示细节的工作，一些细微之处可能决定着古代的一种人神结合类型与另一种之间的重大差异，从而为我国读者提供了反观中华封建王朝的君权神授理论的若干镜子，这恐怕是该书中译本的主要价

^① 作者认为“被第一王朝的第一个国王美尼斯成功地采用的王权，不是像大多数学者认为的那样应归诸功利主义的考虑，而是应归诸美尼斯那有意或无意促成的心理感悟，即在使自己成为上、下埃及两王国唯一统治者的进程中，他将执行一种与埃及人用二元论的词汇理解世界的倾向步调一致的行为。”

值所在。

翻译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本书翻译除了要求良好的英文修养和中文表达能力之外,还需要埃及学和亚述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准备。译者虽然年轻,但已经在埃及学领域耕耘了五年,加之本人勤奋、虚心、执着,练就了坐冷板凳的功夫,因此能够把这样一本比较难啃的英文书转换成相对准确流畅的中文译本,我为郭子林的工作感到由衷的高兴,并为我国世界古代史已经有了像郭子林这样一批年轻学人而感到欣慰。

是为序。

郭小凌

2006年10月2日于京师园

菲尼克斯版本前言

与人类所知两个最古老的文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起源与发展、本性与特征相关的诸多问题已经产生了，并且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些问题一直激发着考古学家、学者和人文主义者的想象力。怎样、何时且为什么史前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变成了以城市和国家为目的的人们，发展了一套条理清晰的宇宙哲学、神学和神话，构建了雄伟的神庙，创立了可使精神放松和使心灵安慰的宗教仪式，发明并发展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书写体系，并创造了意义重大的书面文学？他们是怎样影响到古代希伯来人和希腊人的？如果有任何文明遗迹的话，那么在我们现代社会里他们的文明有什么样的遗迹保留下来了呢？在不断努力地发现和恢复、阐释和阐明这两个被埋葬了很久并被人们忘却了的文明所具有的物质遗迹和精神遗产时，欧美大学和博物馆中相当多的东方学系和考古学研究所便蓬勃地发展起来了。这些系、所当中最具创造力、成果最丰的便是芝加哥大学的东方研究所，《王权与神祇》的作者亨利·富兰克弗特在那里度过其学术生涯当中最辉煌的一个阶段。

富兰克弗特最初是一名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他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都进行过考古发掘，并把考古活动的结果详细全面地发表出来了，还特别强调了这些结果对艺术史的重大意义。然而，就写作《王权与神祇》而言，掌握有关古代文献的专业知识是关键，而富兰克弗特却不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语言学家。幸运的是，在他所在的东方研究所，他有两位著名的同事：埃及学家约翰·威尔逊和楔形文字学家T. 雅克博森，他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都是最重要的学者。他们三个曾合作写出了一系列关于古代近东思辨性思想之本性的论文。这些论文于1946年以《古代人类思想发展史》的题目出版了，这部著作预示 vi

了《王权与神祇》中某些心理学和哲学基础。因此,《王权与神祇》是考古学、艺术史、铭文学和文献学领域最专业的学者们精心提炼的作品。

在《王权与神祇》中,富兰克弗特的中心观点是:尽管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表面上看很相似,但却存在着根本而深刻的相异性;被古代人视作是所有文明生活之基础的王权制度,却在两块土地上受到了完全不同的感悟。在埃及,所有人当中只有国王是神的后裔,他的加冕典礼是一次神的显灵。然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国王是凡人,是一个“伟大的人”,后者是对苏美尔语中国王一词——卢伽尔(*lugal*)的直译,国王的加冕典礼有时被看作是神化活动,即一次圣化仪式,但是,这并未使他成为神的化身。富兰克弗特的观点与许多学者的观点相左,因此,他把自己所有的知识和学问都集中在了详细、逐步地论证两个文明之间这种最关键的相异性上了。

《王权与神祇》分成了两卷七部分:第一卷,共四部分,专门论述埃及;第二卷,共三部分,专门论述美索不达米亚。在第一卷之前是一篇简短的引言,主要是比较在两个社会中艺术所表达出来的王权观念。在埃及,国王被描绘为神世界不可缺少的一分子,并且是整个人类社会具有象征意义的代表。而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则被看作是一位英雄人物,是其民族的首领,与他的伙伴们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证明了论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艺术直接地揭示出了这点)之后,作者把注意力转向了埃及文明,因为他似乎对埃及文明有一种天生的喜好,并通过考察埃及王权的历史和理论基础开始了第一部分。富兰克弗特对这个主题的阐述,揭示和证明了他的洞察力,这使本书整体上与众不同。这样,被第一王朝的第一个国王美尼斯成功地采用的王权,不是像大多数学者认为的那样应归功于功利主义的考虑,而是应归功于美尼斯那有意或无意促成的心理感悟,即在使自己成为上、下埃及两王国唯一统治者的过程中,他将执行一种与埃及人用二元论的词汇理解世界的倾向步调一致的行为。埃及人认为世界“就像一系列相对立的对立物以不变的均势保持着平衡”。就王权的理论基础而言,富兰克弗特对重要的“孟菲斯神学”深刻而详细地阐释,不仅阐明了国王被看作是神这样一种观念,还阐明了王权使活着的儿子荷鲁斯与去世的父亲奥西里斯这两代永远神秘地契合起来了。

作为神，埃及的国王对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具有绝对权威，然而他不能任意武断地行事，而只能根据玛阿特，即“正确的秩序”行事。王权的作用是第二部分讨论的内容。在这一部分中，作者考察了由难以理解的和具有暗示性的词语——卡所表达出来的王权的本性、考察了在塞德节中王权仪式性的更新和再生、考察了有时被称为“荷鲁斯的追随者”的国王祖先之精灵所起作用的意义。

在所有埃及人的生活中，国王的去世是一件关键性的事件，因为国王的去世表明混乱和邪恶之神在大地上占据了上风，至少直到新国王的登基和加冕典礼时为止。这是第三部分的主题。在这一部分，作者用一种巧妙的方式，重构了神庙浮雕、金字塔文以及《继承神秘剧》中记载的加冕典礼的主要特征。《继承神秘剧》是以国王森努塞尔特登基时演出的戏剧剧本为基础的。

已经讨论了文献、仪式和绘画作品描绘出的法老神性和法老在神世界中的地位，作者开始讨论埃及宗教那像巨大迷宫一样的结构。这是第四部分的主题。在这部分中，他考察、分析、解释和阐明了在埃及宗教思想和实践中神显灵的主要范畴，这些是：神在太阳中显灵意味着创造，神在牛身上显灵意味着生殖，神在大地上显灵意味着复活。

第二卷阐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王权，这种制度的起源和特征不能像埃及人领悟埃及宗教那样清晰地被美索不达米亚人所领悟，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了几个不同的民族：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因此，第五部分（第二卷的第一部分）一开始便对论文进行了合情合理的辩护，即在美索不达米亚王权观念没有受到种族更替和政治变革的重大影响。文章继续分析了美索不达米亚王权的神学观念。结果表明：美索不达米亚王权观念缺乏埃及王权观念那种更加令人敬畏的因素，因为尽管国王被认为是由神选择出来作为自己的职员的，但他不得不通过仪式、梦幻和征兆进行探索，以了解怎样执行他那庄严的职责。

第六部分阐述了国王的作用，有三重意义：管理国家；代表那些为了确保幸福和健康的人们进行祈祷；通过建立和重建神庙以及在国家节日上主持宗教仪式来为众神服务。

美索不达米亚社会渗透着无常和焦虑。而且也不像埃及社会的

宗教,美索不达米亚的宗教没有被诸如创造、生殖和复活这样具有安慰性的观念所操控,而是被一个关于一位受苦受难的神和一位哀嚎不休的母亲神的神话所操控着。这是本书最后一部分讨论的主题。这部分包括如下内容:详细阐述了具有争议性的国王神化观念,并详细阐述了新年节那深刻的宗教特征,以及一个值得注意的补论,驳斥了由弗雷泽在他的《金枝》(*Golden Bough*)中提出的观点,即“死神”的主要特征具有普遍性。

接下来是一篇简短的结语,讨论了希伯来王权的本性,它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王权都存在根本的区别。此书以 60 多页阐释性的注释结尾,主要是为东方学专业人士作指导。

从前面的内容浏览中,很明显地看到,《王权与神祇》对文明史的研究做出了崭新而富于启发性的根本贡献。不是所有的学者都会同意本书中所有的阐述、阐释和结论。我本人也会就与美索不达米亚相关的几个问题与其进行辩论。但是,基本上这些不同意见和分歧都是相对次要的,无论如何,不会减损本书在认识和理解人类及其古代史方面的巨大价值。我坚信:在适当的时候,《王权与神祇》将被奉为东方学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

S. N. 克莱默尔

前　　言

ix

原始人的创造物是难以捉摸的。原始人的观念似乎难以定义，甚或它们是公然反对限定范围的。每一种联系都是本质的一部分。部分分享整体，名字分享个人，影子和肖像分享原型。这种“玄妙的分享”减少了区别的重要性，却增加了所有类似的重要性。这与我们的思维习惯格格不入。因此，我们的思维和语言手段不完全适用于描述原始观念。

我们想把单独的概念孤立起来研究。但是，无论什么时候进行这样的尝试，我们都会发现自己只是抓住了一张已投出的宽大网罗上的一个网眼；而且我们似乎会受到这样的谴责：我们要么沿着其分支进入了古代生活最遥远的角落，要么弄断了线索还佯称观念与原始思想的关系就这样被强有力地隔离开来了。

如果我们打算研究形成最古老文明社会之核心的王权制度，就必须得意识到我们已说明了的那些思维的区别。在探索古代近东王权的政治和经济作用时，我们发现，诸多不合逻辑的因素处处都在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虑王权的宗教意义并寻找其神学依据，那么将发现，这使我们一开始就会面对众多的创世故事，后者是为了把第一日与诸多现象等同起来，这些现象是：每日日出、每一个新年、每一位国王的登基，甚至国王每次在御座和战场上的出现。

我们不能仿效编年学，从人们所知最早的制度形式开始，描述王权制度的持续变化。在这样做时，我们将发现自己正在叙述仍然是不可思议的基本观念诸多无关紧要的模式。相反，如果我们仿效这样的方式，即描绘一种被设想为普遍有效的王权“模式”，并安排我们的材料以适应这一模式，那么我们将忽略王权的特性，而特性又是古代人所熟知的王权制度的本质。

我们的阐述将是非历史性的；但是，之所以这样，仅仅因为我们的阐述漠视而非违背历史事实。这种阐述将是现象学的，因为那将是对“发现了的事情进行系统讨论”。但是，我们的阐述不会采取单线条的论证；相反地，我们的讨论将从不同的方面汇集到中心问题上来。这 x 种传统方法也存在缺点。我们会发现，很难感受到古代人思想的一致性；在每一条道路上，我们必定会触摸到诸多现象，这些现象只有通过另一种途径才能得到全面理解，因此也暂时考验了读者的耐性。

希腊的成就和《新约全书》、《旧约全书》的教义都是我们与古代人疏远的基础。因此，把古代近东设想为一个整体是符合逻辑的。但是，幸运的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在精神领域存在深刻的区别。因为，如果在穿越把我们分离开来的深渊时，一会儿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伟大文明中心上，一会儿把注意力放在那个伟大文明中心上，我们会发现相异与相似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使我们的眼光大大地敏锐起来。而且，通过与希伯来人的比较，这两大文明中心都可以获得较强烈的宽慰了，因为希伯来人熟悉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却强烈排斥由后两者认可的最高价值。

我们已在引言中粗略地陈述了我们的主题，并因此也是用武断的形式陈述了必要的主题，目的仅仅是给读者提供指导，使其在注意阅读具体的细节、证据和论点之前先浏览整个领域的内容。引言也通过表述从艺术中发现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王权观念，证明了两种王权观念是有区别的。这个证据是完整明确的，而且能够被直接把握的，不用考虑古代艺人与现代观众之间观念上的区别。^①

在讨论文字材料时，我们已试图把文献、仪式和节日描绘为政治和宗教的实践结果。而且，我们已尽可能用具体的方式引用传统内容。这意味着把大量细节放在了读者面前。但是，把那些貌似精确的词汇插入我们的概念与古代人的概念之间，结果像“神圣的国王”、“地方神”、“高级神”等等这样的抽象词汇和习惯用语，便很容易变成我们

^① 引言的基础是美国东方学会百年庆典期间，我于 1942 年 4 月 9 日在波士顿美国社会与科学学院朗读的一篇论文。

理解中的障碍。不管怎样贴切，也没有任何概括性词汇可以代替这些实际的词汇形式，后者表达出了精神生活。画像不是古代思想的附属品或装饰品，古代思想以一种与智慧有同样多的洞察力和想象力的方式得出结论。因此，当我们在不考虑古代人的画像时，一些重要的东西便丢失了。

我们希望与读者一起分享一种由粗糙刻画在建筑物上的文字极好地表达出来的情绪，那就是希腊游客在法老纪念物上刻画的：我来到了并大为震惊。因为，尽管我们已通过阐述个性化的原始思想而开始了这篇序言，而且有时借助现代野蛮人，我们已接触到了古代人，但是我们的著作是靠这样的方式产生的，即证明前希腊人理解世界的思想结构是与他那更加真实的纪念物一样是史无前例的成就。

体现我们主题的文学作品是浩繁的。最近的一部著作用 23 页的目录索引来记录这些文学作品，我们在这里很高兴提到那本目录。^①当我们感到致谢是值得的或清晰驳斥一种观点的议题有用时，我们便会引用之；这样的讨论由注释来完成。在其他情况下，不同意见会默默地暗示出来，这本书解除了争论的负担。

就一手材料而言，那些用楔形文字写成的是我无法使用的，而我的埃及语知识还不足以保证对悬而未定的语法点进行独立判断。我的朋友 T. 雅克博森和 J.A. 威尔逊教授最为慷慨地帮助我处理了这些文献，尽管他们都不会为那些没有标出是他们的翻译的内容负责。其中一些是我们合作撰写有关“古代近东思辨思想”（以《古代人类思想发展史》[芝加哥，1946 年]出版发行）的一系列公开论文时翻译的。由于这个原因，并因为神话创作思想的变化过程在那些论文中被充分讨论了，所以似乎有必要出版我们首先合作的成果，尽管目前这本书本质上是我在递交学位论文时完成的。

手稿出版之前，战争期间出现在欧洲的出版物可能只用于很有限的范围。

^① Ivan Engnell, *Studies in Divine Kingship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Uppsala, 1943), pp. 236—246.

我要感谢 H. H. 奈尔逊、K. C. 希勒、S. I. 菲根、R. A. 巴克尔和 M. 利希特姆博士们，他们为我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并且要感谢 C. 奈丝特曼小姐，她对我的手稿进行了精确、认真的修改，并为本书准备了解析性的索引。

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芝加哥和新丹佛

1942 年—1945 年

致 谢

作者希望感谢下面这些人,因为他们允许作者从他们的出版物或者从那些经过精心处理的原始照片中翻版图片。他们是:

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所长,提供了图 2、3、5、9、10、12、14、42、46 和 50。

S. 史密斯先生和大英博物馆的管理人员,提供了图 8、11、31、37 和 24。

纽约都市艺术博物馆埃及收集品办公室的主任,提供了图 31、33 和 36。

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的馆长,提供了图 13。

海牙出版公司的 M. 尼杰霍夫先生,提供了图 40 和 41。

纽约的 W. 哈弗塞尔先生,提供了图 4。

缩略语对照表

<i>AJSL</i>	<i>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i> . Chicago, 1894—1941.
<i>AO</i>	<i>Der alte Orient</i> . “Gemeinverständliche Darstellung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Vorderasiatischen Gesellschaft”. Leipzig, 1903—.
<i>ASAE</i>	<i>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l'Egypt</i> . Cairo, 1900—.
Borchardt, <i>Neuserre</i>	LUDWIG BORCHARDT. <i>Das Grabdenkmal des Königs Ne-userre</i> . “Wissenschaftliche Veröffentlichung der Deutschen Orient-Gesellschaft”, No. 7. Leipzig, 1907.
Borchardt, <i>Sahure</i>	LUDWIG BORCHARDT. <i>Das Grabdenkmal des Königs Ša'hu-re</i> , Vols. I and II. “Wissenschaftliche Veröffentlichung der Deutschen Orient-Gesellschaft”, Nos. 14 and 26. Leipzig, 1910 and 1913.
<i>Code</i>	R. F. HARPER. <i>The Code of Hammurabi</i> . Chicago, 1934.
De Buck, <i>Oerheuvel</i>	ADRIAAN DE BUCK. <i>De egyptische Voorstellingen betreffende den Oerheuvel</i> . Leiden, 1922.
Erman, <i>Religion</i>	ADOLD ERMAN. <i>Die Religion der Ägypter</i> . Berlin, 1934.
Erman-Blachman, <i>Literature</i>	ADOLD ERMAN. <i>The Literature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i> .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AYLWAUS M. BLACKMAN. London, 1927.
Gressmann, <i>AOTB</i>	<i>Altorientalische Texte und Bilder zum Alten Testamente</i> . 2d ed. Herausgegeben von HUGO GRESSMANN. Berlin, 1926.
<i>JAOS</i>	<i>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i> . Boston, Baltimore, etc., 1894—.
<i>JEA</i>	<i>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i> . London, 1914—.
Jéquier, <i>Pepi II</i>	GUSRAVE JÉQUIER. <i>Lemonument funéraire de Pepi II</i> , Vol. II: <i>Le temple</i> . Le Caire: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Fouilles à